

如何在社區內落實環境保護

《汪美偉》

——紮根理論研究法初探的發現

壹、背景概述

本世紀以來，人類因各項活動所產生的污染，已對全球環境造成莫大衝擊（Yearley, 1991）。舉凡臭氧層破洞、熱帶雨林急速消失、核廢料處置糾紛、稀有動物瀕臨絕種，或土壤含重金屬、空氣污穢、水源不潔，以及垃圾量增等，不僅在世界各國引發高度關注，掀起環保熱潮與所謂的「綠色革命」（The Green Movement）（如AHEC, 1994; Yearley, 1995）；即使在台灣，環境保護問題，也隨著環保意識的變遷（如增設核能發電廠引起的爭議），或因社區利害衝突（如某些鄉鎮間之垃圾大戰），與國際壓力（如犀牛角事件）等，而在經濟發展之後，日漸受到重視（如陳鎮東，民八十三）。

社會工作專業向致力於社會問題之處遇（如李增祿，民八〇；簡春安，民八〇），也強調人和環境的協調與平衡（如Ephoritic, 1997; Johnson, 1995）。由於環境保護關乎衆人生活品質，以及人類

整體生命的「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如林俊義，民八十四；Catton & Dunlap, 1978）與社工專業之理念多所符合，因此近些年來，推行環保觀念、投身環保運動，或從事環保研究的社工有關人員，也相形增加（如Ferguson, 1983; Irwin, 1995）。這不但使環境保護成為社工專業者可資貢獻的範疇，在多项社會工作方法中，以社群為服務對象，又能同時結合個案、團體、行政、或教育、研究，甚至方案評估和社會運動等的「社區工作」，委實成為社會工作者在環境保護方面，可充分發揮專業知能的領域。

社會工作者運用社區工作方法推動環境保護，可採用不同的取向。例如「地方發展」（locality development）模型，注重居民社區意識和自發精神之培育；「社會計畫」（social planning）模型重視專家領導暨規劃技能之應用；「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模型則著重於大眾組織之掌握及群眾之指引（Rothman, 1979；徐震、林萬億，民七十七）。然而，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不只有賴政府、專業者或民間團體之努力，最終必將環保理念和作法，落實到社區居民個人層

面，才能達到長期與實際的效果（黃澄月等，民八十一）。是以，在「地方發展」方面，若能依照社區環保問題實況，深入了解居民，則較易啓發他們對環境保護產生「利害與共」的關切，後續環保行為也較可能持久。在「社會計畫」方面，若有社區居民環保態度和行為的實際資料，可供參酌，則在計畫和執行時，可減少阻力，獲取支持。至於在「社會行動」方面，若能依據社區實徵資料，合理反應居民訴求，從而影響政府與民衆，於環保觀念及作為上，進行適當變遷，則政治與社會行動的成果可持續，環境保護亦不致淪為空談。

由上可知，欲於一社區內推動環境保護，就有蒐集該社區居民對環保認識與作法等實徵資料的必要。藉此類資料，社區工作者便能找到處理環保問題的基點，從而採取合乎實際的取向與作法，並達成落實環境保護的目的。

貳、研究動機

目前於社工專業相關研究上，常有缺憾者，乃國內本土實徵資料（empirical data）之不足（如曾華源、黃俐婷，民八十五）。在環境保護課題方面，雖有學者曾進行個人背景因素與環保認知、態度及行為之相關研究（如丁庭宇等，民七十七；吳南城、饒達欽，民八十一；吳涵文、劉潔心，民八十一），學術單位曾在實驗社區實施環保方案研究（黃澄月等，民八十一），又有政府機構推行環保宣導並提出成果報告（如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年報，民八十四），以及傳播媒體或專業書刊對環保問題的報導與分析等，與如何在社區內落實環境保

護，似仍有段差距，參考價值受到限制。爲了彌補這樣的缺憾，現階段進入田野（the field）（即社區），重新蒐集資料，以作爲落實環保工作的依據，確有必要。

再從實務運作層面來說，目前各級政府皆積極在各所屬區域內施行環保計畫（如台北市之三合一資源回收計畫與高雄市政府之環境監測與檢驗工作），又有社區內教育單位的支持（如各中、小學的資源回收工作與若干大學院校之環境教育課程）（如徐妙琴，民八十三；袁中新、黃俊英，民八十三），或社區團體之舉辦相關活動（如宗教團體之環保教室和惜福宣揚）等，但從現象學（Phenomenology）觀點看來，卻未見環保行為在一般的社區居民身上顯現。這樣的情況，既有各項環保方案實行效果不彰的隱憂，又顯示現階段回到社區蒐集實徵資料的急迫性，值得環保工作與研究者注意。

有鑑於此，本文作者特運用紮根理論研究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在台北市大直和永安社區，進行一小規模探索性研究，探討和受訪者環境保護行為和觀念相關的發現，並歸納出落實社區環保工作的指標（indicators）。期藉此小規模研究，拋磚引玉，促社會工作與有關領域學者，更重視社區環境保護之研究與推動。

參、研究方法

科學知識之取得，若藉由演繹方法（the deductive method），當是在既存的文獻，或已提出的理論當中，擷取適切於研究主題的論述，或驗證相關的假設，而說明變項間的關係（如Glaser, 1978; Glaser

& Strauss, 1967; Hutchinson, 1993)。對於理論尚未發展完全與尚處於探索階段的研究領域，或領域內原有理論無法完整解釋有關現象，或甚在實際操作時，採用原有理論，卻發生窒礙難行困境的狀況，研究者與操作者即須回顧實務經驗，借重歸納方法(the inductive method)，來解釋現象內涵，並歸結現象的可能緣由，從而補充理論、修正理論，或者發展新理論(如 Lempert, 1992)。所謂紮根理論研究法，簡言之，就是由搜集與分析實徵資料，再由所得結果，發展理論的過程(如 Sarantakos, 1995)。此研究方法雖極為複雜繁瑣，學者卻已提出明確的步驟(Strauss & Corbin, 1990)。因此，在社會學既存理論之驗證已接近飽和，社會工作亟須建立自身專業理論的現今，此研究法便廣受學術界暨實務界重視，其顯著性也益形增強(如 Strauss & Corbin, 1995)。

由於現今有關吾國社區居民環境保護觀念及作法之本土實徵資料與理論，十分缺乏，為探究如何落實社區環保，實宜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法。這也就是說，宜先進入田野搜集資料，再依據所得資料，剖析社區居民環保有關的認知或態度，以及行為上的特質；並應用該些發現或結果，建構模型、發展理論，以作為後續驗證性研究或服務方案的基礎。

囿於現實者，為本研究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條件。是故，本研究僅與大直、永安社區四位居民各進行一次深度會談(in-depth interview)，並對其中一位受訪者，實施一次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除分析、歸納與受訪者環保意識及行為有關的若干主

題內涵(themes)，亦得到可能有助於日後建構模型的指標。期藉由本研究的發現，引發更多研究，並助益社區環保工作之推行與落實。

肆、研究歷程

本研究執行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至二月間，受訪樣本以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得之(Glaser & Strauss, 1967, 1968; Strauss & Corbin, 1995)。四名受訪者分別為一號二十七歲高中程度之家庭主婦(大直社區)，一號五十四歲小學程度之男性商販(永安社區)，三號四十二歲碩士程度之男性貿易公司經理(永安社區)，以及四號二十二歲之女性大學生(大直社區)。所有會談內容皆錄音，並使用逐字稿(transcriptions)逐步分析(如徐宗國，民七十五、七十八)。為符合紮根理論研究法的程序，每次訪問之後，即謄抄逐字稿；在一份逐字稿分析完畢，歸結出重要現象內涵與類別後，才繼續下一次的會談(Minichiello, et al., 1995)。因此，在各次會談之間，詢問受訪者的問題，便有些修正。綜合言之，每次會談皆詢及「您認為『環境保護』是什麼？」，「您認為應當怎麼做才能增進環境保護？」，以及「您或您的社區怎麼做環境保護？」等三題。由於作者服務機構位於大直，受訪者基於地緣關係或朋友間輾轉認識，大體上相當合作，使研究過程順利，令作者感到欣慰。

基於第一次會談的經驗，所詢問問題之次序，也自第二次會談起有所調整。大體而言，後三次的會談，皆從所住社區的環境談起，再詢受訪者有關社區內環境保護措施之現況，並由現況引發受訪者對自

身與社區責任的探討。其間雖有受訪者略感不耐（如二號受訪者對會談時間較長有些微詞），整體搜集資料過程，仍尚稱平順。各次會談時間，自四十分鐘至二個小時不等。最後，為彌補受訪者在回憶不同事件時，所可能發生的記憶落差，又為獲取受訪者無法經由意識過程及語言使用來表達的資料，作者特地在四次會談結束之後，情商一號受訪者，到她家中，實施一次約八小時的參與觀察（註1）。

該名受訪者平日一人在家，照顧一名幼兒和一名嬰兒。她對作者以不干擾她的方式，觀察她一日之內（由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五時半）的正常活動，表示可以接受。就在觀察開始時，她即反應無法習慣作者在兩、三個定點觀察她。作者只好改以類似訪客的角色，在客廳、飯桌附近及廚房，隨受訪者活動而移動位置，並隨時聊談。受訪者午休時，作者則以整理資料度過。

是項參與觀察，亦具有探索環保行為，在該名特定社區居民生活中，所佔比重為何的功能。雖然設計上不夠嚴謹，於實施時間的長短與觀察的層面上，亦嫌不足，但所獲資料，仍能補充會談之缺失，對本研究而言，可說是助益良多。

伍、研究發現

台灣在經濟發達之後，污染問題嚴重，環境保護相對重要，是四位受訪者對環保課題共同的認知。然而，經由深入分析，受訪者實際環保行為與環保認知之間，卻存有很大差距。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為了暫時的便利，而犧牲長遠或他人福祉的消費行為傾向。再者，四位

受訪者雖對全國性或整體性（如台北市全體的）環保措施，感到不足，但在意識層面上，卻都用了「無能為力」，「已照規定配合辦理」，以及「所住社區已優於其他地區」等解釋方式，來界定自己在環境保護上的角色，或形成與社區相關的環保自我概念（註2）。

從上述的發展深究，四位受訪者對環境保護的界定，以關乎自身生活的措施為重心（註3）；對環境保護工作，具明顯無力感；相形之下，對環境保護的要求也不高。因此，他們對社區環境與社區環保現況，大體感到滿意；對環境保護活動的主動參與意願，則十分低落。這正顯示，環境保護對他們來說，基本上不是一個重要課題，而社區參與更不是他們所關心的焦點。

值得以「例外」情況進行探究的是（註4），受訪者若認知到某項環保行為與己身某項迫切的利益有關，則可能會去執行是項環保行為。反之，受訪者若為了所認知與己身迫切相關的利益，也可能會忽略、甚至牴觸某項環保行為的要求。例如在參與觀察中發現，一號受訪者在清洗餐具時並沒有使用洗潔劑。經過事後確認，她為了避免洗劑殘留影響自己與子女健康，改用紗布質料的抹布，多次搓洗碗盤，雖很少使用洗劑，效果也不差。由此可知，這位受訪者為了所認知的迫切利益，會依據所有之環保知識，去執行某項環保行為。

然而在觀察中也發現，這位受訪者在丟棄使用過的尿片時，用了兩個塑膠袋包裹一片尿片。作者同樣在觀察後與受訪者討論此事，她表示消除異味、保持屋內空氣清爽是她多用塑膠袋的目的。她也說到，她知道用塑膠袋「不環保」，但用的時候並不會想到這個問題。由此

可知，受訪者爲了所認知與己身迫切相關的利益（如爲了屋內空氣清爽），可能會忽略或抵觸某項環保行爲的要求（如應該儘量少或不使用塑膠袋）——即使是一項早就學習過，或耳熟能詳的環保要求。

類似的例子在會談中亦有發現。例如二號受訪者就清楚表示，他是爲了避免受罰（他認爲罰鍰金額甚高），才調整自己作息時間，來配合垃圾定時收集與不落地政策。避免金錢的損失，正是他所認知的迫切性利益。在此例中亦顯示公權力對居民環保行爲產生的強制作用：這位受訪者在公權力的強制要求下，選擇了所認定較符合自身利益的行爲（如避免受罰），終而導致環保行爲的發生（如配合定時、定點收集垃圾）。

另一較具引申意味的例子則是，三號受訪者提及永安社區內某巷道，在垃圾定時定點收集與不落地政策施行後，已成了一個新的垃圾場。（作者對此事亦曾親自查證）。這正顯示，居民爲了便利，或因無法配合政策，便隨處丟棄垃圾，甚至把這樣的行動，用「集體行爲」的方式表達出來，使巷道變成了垃圾場。姑不論該巷道的人口特質與地理位置特徵，或此舉動是否導致衛生問題或野狗聚集，此項「集體行爲」，卻有如台灣民衆大量、整體性地使用免洗餐具（註5）：雖然可能有許多人知道保麗龍餐具的毒害與不易分解的特性，以及紙餐具破壞森林的事實，但是當使用免洗餐具成爲一種集體或群體式行爲時，群體中的個人就會跟隨群體，去執行這樣的行爲，並且不會考量這樣行爲的正當性。

同理可知，當某些居民在巷道內堆積垃圾，其他居民亦有跟進的

可能。居民們這樣做固然是爲了便利（因爲他們認爲自己無配合政策）——這是他們所認知的迫切性利益。然而集體行爲的特點也隨即出現：傾倒垃圾的居民不再意識自己行爲是否正當，只是跟隨群體去執行是項作爲。造成的結果是，只要是衆人的行爲，即使不符合環保原則，也是可以接受，或是應當忍受的。

綜上所述，環保知識仍是環保行爲重要的基礎（如知道洗劑殘留不利健康，所以避免不用）；公權力的強制作用，也可引發若干環保行爲（如用罰鍰方式可促成社區居民配合環保政策）。然而環保行爲的產生與否，一方面受到個人對環保知識選擇性運用的影響，二方面又有集體行爲這一條件的作用，並非徒具知識或強制要求，就可讓社區居民產生環境保護的行爲。再者，從本研究的發現，影響受訪者或居民個人對環保知識選擇運用的主要原因是便利與其他所認知的迫切利益。所以知識、強制、便利、急迫及集體性等五項因素便成了受訪者或居民是否執行環保行爲的關鍵指標。這也是本研究所得落實社區環保工作的指標。

陸、研究初結

綜析本研究所獲資料，並依據上述的相關發現，本研究特就一、便利性，二、迫切性，三、集體性，四、知識性，以及五、強制性等五項指標因素，提出在社區內落實環境保護的初步作法：

一、便利性

從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爲了自身的便利，極易忽略或違反環保要求。再由巷道轉變成垃圾場的事實看來，社區民衆確可能爲了暫時的便利，不但忽視環境的保護，甚至做出違反環保法令或規定的行爲。基於這些發現，民衆對生活便利的要求很高，所以有關環境保護措施的推動，若能顧及便利與便民，其落實的可能性就可提高，效果亦必較大。

再以台北市垃圾定點定時收集與不落地政策爲例，四位受訪者皆表示曾爲了配合該措施，而調整自己作息，並且也都認識了社區內其他的居民，因爲工作或疾病，無法執行該政策的規定。這樣看起來，若社區可以爭取或編列若干預算，實施社區整體的彈性時間收集服務，就可能增加居民處理廢棄物的便利性，而環保的效果也可提升。

二、迫切性

此處所指的「迫切性」，具有引申的意義。這也就是說，受訪者會對於攸關己利的環保知識或資訊，感到關切；並會因這樣的關切，發生與該環保知識或資訊相關的環保行爲。雖然上節所述的便利考量，也可能是受訪者的急迫需求，但此處所強調的迫切性，則是指稱受訪者（或居民）深入與急迫的關切感受。這樣的感受確是引發環保行爲的動力（例如受訪者曾爲了健康，或爲了愛惜金錢，做了一些積極性或消極性的環保行爲）。因此，社工人員若能在社區之內，善用傳播、溝通和教育等管道，協助居民對環境保護加強與己有關的「利害與共」感，則在行爲方面，就可能減少消費主義的影響，而有更實際的環保行爲表現。

三、集體性

從本研究發現可知，環保知識或認知，在「集體行爲」條件的作下，可能導致環保行爲的增強或減弱。從上述巷道變爲垃圾場之例，可見集體行爲可能導致個人忽略或違反環保原則。再從另一例子分析，則集體之力量，也可能影響個人產生環保行爲。此例乃是四號受訪者受同儕之影響，要求男友機車排氣須符合標準，而這項標準也成了受訪者同儕與男友團體中的共同行爲準則。由此可知，善用集體行爲之力量，妥善誘導社區居民發生環境保護行爲，確是落實社區環保的重要環結，值得社工專業者關注。

四、知識性

雖然環保知識的有無，並不能確保環保行爲的發生，但環保知識仍是環保行爲的重要基礎。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環保知識較缺乏的受訪者，其環保行爲的質與量也較低，甚至在界定何謂環境保護時，亦傾向認定環境保護就只是資源回收。雖然已有研究證實教育程度較高者，其環保認知亦較高（如丁庭宇等，民七十七），不過落實社區環保是全面性的工作，必須普遍提升社區整體性的環保知識，環保工作才能紮根。是以，社區工作者應深入社區各階層，從事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之宣導與執行（如陳復，民八十三），才能收到實質的效果。

五、強制性

雖然以社工專業爲主導的各項社區環保活動，貴在社區居民真誠、

主動的參與，但公權力的強制約束，也是落實社區環保工作的助力。例如二號受訪者就曾提到爲了不願受罰而配合垃圾定時收集，而三號受訪者也曾表示，若環保人員可加強取締，則隨意傾倒垃圾的居民就可能減少。可見公權力的強制性，對社區居民環保行爲的產生有一定的影響力。社工人員爲落實社區的環境保護，實應適度運用公權力，來促成居民環保行爲的產生和持續。

柒、建議事項

本研究爲落實社區環境保護之初探研究，由於人力、物力和時間的限制，僅針對影響受訪者或居民環保行爲之五項因素指標，加以分析和探討。在社區工作實務上，如能將該五項指標，納入所使用的工模型中（如地方發展、社會計畫、以及社會行動模型、參Rothman, 1979；徐震、林萬億，民七十七），則於落實社區環境保護，應可產生更具體之效果。有鑑於此，本研究特將所歸納之五項指標，配合上述三模型，提出落實社區環境保護之具體建議如次：

一、在地方發展模型中，宜積極辦理成人環境教育；其主要目的在普遍提升社區居民環保知識程度，並加強居民對環保措施的急迫需要感。

二、在社會計畫模型中，宜強調便民的重要性與公權力的適當運用；良好的社會性規劃須賴多數民衆的支持與合作；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日，環保措施若能兼顧民衆的便利，則其落實效果可期。然爲社區整體環保目標之達成，卻不能縱容少數違反社區整體福祉的行爲，

因此公權力的強制內涵，亦是社區計畫的要項。

三、在社會行動模型中，宜妥善應用集體行爲的影響；集體行爲常是導致居民環保行爲與非環保行爲產生的背景因素，社區工作人員若能善用群體對社區個別居民的影響力，則落實環保的期待，便較容易達成。因此，社工人員對社群集體行爲傾向，宜多加研究與誘導，以促成社區居民環保行爲合宜的變遷。

以上謹就紮根理論研究法之初探發現，提出五項指標與可行之建議，期有後續研究，進一步建構相關之理論或模型，則對落實社區環境保護，必將有更長遠的助益。

（本文作者現任實踐設計管理學院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註釋

註1：參與觀察和深度會談同列爲紮根理論研究法中主要的搜集資料方法（可參Strauss & Corbin, 1990）。

註2：關於受訪者界定自己在環保上的角色與自我概念之歷程，亦可另用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爲架構進行探討，本文暫不涉獵。（符號互動論參Mead, 1934及Goffman, 1965等）。

註3：在符號互動論的影響下，紮根理論研究者時常探究受訪者本身如何界定或解釋情境。這樣的作法，可避免研究者將外來的（exotic）定義或標準，強套於本土的研究，對於了解現象的本質，助益良多。例如本研究受訪者在界定「環境保護」時，皆以與己身生活相關的「措施」爲重心，並未深究環保的本質和目的。這

就表示理論上（其實是西方理論上）的環保理念，和受訪者實際生活仍相去甚遠，甚至並不存在受訪者的實際生活當中。

註4：質化研究法（th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的特點之一，就是能對通則以外的例外情況加以探討（如Minichiello等，1995），這樣的作法能增進對現象內涵的瞭解。

註5：「比較分析」是紮根理論研究法的重要步驟之一（參Glaser & Strauss, 1967, 1968等）。本研究此處將傾倒垃圾與使用免洗餐具，做粗略的比較。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1. 丁庭宇、鄭為元、劉淑玲、鄭陸霖 台灣地區民衆對垃圾處理行為之研究 社會學刊（台大） 十九期 民國七十七年 頁一二三—一六四
2.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編印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年報 民國八十四年
3.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合一資源回收計畫簡介 民國八十五年
4. 吳南城、饒達欽 台灣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工科各類群環境教育現況調查（II） 七十七—八十年度大型計畫成果簡輯 頁三〇五—三〇六 國科會 民國八十一年
5. 李增祿 社會工作之意義及發展 李增祿主編「社會工作概論」第一章 巨流 民國八十年
6. 林俊義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年報序 民國八十四年

7. 美國闊葉木外銷委員會駐華辦事處（American Hardwood Export Council, AHEC）專案報導 民國八十三年

8. 袁中新、黃俊英 大學環境教育之省思與教材編纂——以中山大學為例 中國環保 十九期 頁七五—八二 民國八十三年

9. 徐妙琴 談中小學實施環境教育之必要性 中國環保 一九期 頁七二—七四 民國八十三年

10. 徐宗國 由田野研究資料建立紮根的理论 社會學刊（台大） 十八期 頁五一—六二 民國七十五年

11. 徐宗國 用田野方法研究少數民族 法商學報 二三期 頁一五五—一七七 民國七十八年

12. 徐震、林萬億 當代社會工作 五南 民國七十七年

13. 晏涵文、劉潔心 台灣地區高級職業學校環境教育現況調查研究 七十七—八〇年度大型計畫成果簡輯 頁二九六—二九七 國科會 民國八十一年

14. 陳復 環境科學技術熱點 中國環保 十九期 頁五六—五九 民國八十三年

15. 陳鎮東 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 中國環保 二一、二二期 頁一六六—一六七 民國八十三年

16. 曾華源、黃俐婷 我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本土化必要性之探討 社區發展季刊 七六期 頁五三一—六〇 民國八十五年

17. 黃澄月、汪美偉、褚玫玲、蘇珊、蘇真真 實驗社區婦女參與廢棄物處理之方案研究——以大直永安社區為例 社區發展研訓中心 民

國八十一年

18 簡春安 社會工作之本質 李增祿主編「社會工作概論」第二章

巨流 民國八十年

英文部分

- ¹ Catton, W.R. & Dunlap, R.E. (1978)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 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3:41-49.
- ² Ferguson, B.K. (1983). *Whither Water? The Fragile Futur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Resource*. The Futurist, (April, 1983):29-36.
- ³ Glaser, B.G. (1978). *Theoretical Sensitivity*. The Sociology Press, California.
- ⁴ Glaser, B.G. & Strauss, A.L. (1967, 1968).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Adline, Chicago.
- ⁵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Doubleday Anchor Books, Garden City.
- ⁶ Hepworth, D.H., Rooney, R.H. & Larsen J.A. (1997).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California.
- ⁷ Hutchinson, S.A. (1993). *Grounded Theory: The Method*. In P.L. Munhall & C.O. Boyd (Eds), *Nursing Research: A Qualitative Perspective* p.p. 180-212. National League for Nursing Press, New York.
- ⁸ Irwin, A. (1995). *Citizen Science*. Routledge, London.
- ⁹ Johnson, L.C. (1995).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Fifth Edition. Allyn & Bacon, Massachusetts.
- ¹⁰ Lempert, L.B. (1992). *The Crucible: Violence, Helpseeking, and Abused Women's Transformations of Self*.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 ¹¹ Mead G.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¹² Minichiello, V., Aroni, R., Timetll, E. & Alexander L. (1995). *In-depth Interviewing*, Second Edition. Longman, Melbourne.
- ¹³ Rothman, J. (1979).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Their Mixing and Phasing*. In F.M. Cox, J.L. Erlich, J. Rothman, J.E. Tropman (Eds.),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F.E. Peacock, Illinois.
- ¹⁴ Sarantakos, S. (1995). *Social Research*. Macmillar, Sydney.
- ¹⁵ Strauss, A.L. & Corbin, J.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California.
- ¹⁶ Strauss, A.L. & Corbin, J. (1995).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N.K.Denzin & Y.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273-285. SAGE, California.
- ¹⁷ Yearley, S. (1991). *The Green Case*. Routledge, London.
- ¹⁸ Yearley, S. (1995).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Routledge, London.